

## 范文瀾與吳承仕： 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的世代變遷\*

葉毅均 \*\*

今日被中國大陸史學界譽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大師的范文瀾，實際上應用馬列主義理論以從事史學著述的始點，為其遲至對日抗戰期間才撰寫的《中國通史簡編》。由於該書大獲成功，此後經過不斷修訂，成為延安史學的一面旗幟。就范氏個人追求並信仰馬列主義的歷程而言，此一「後五四」時代的發展理所當然，純屬再合理也不過之事。然而，另一方面，人間萬事於合理性之外仍有偶然性，非由後設之目的論所能解釋。身為章太炎弟子的老輩著宿吳承仕，與范文瀾擁有相似的教育背景，國學素養深厚。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他在思想意態方面也有著同樣可謂為「從煩惱到快樂」的歷程。況且，吳氏不但年齒較長，資望更勝范氏一籌。若非其人意外早亡，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或將別具一番面貌。本文於考述史實之餘，應用韋伯(Max Weber)之「客觀可能性」(*objektive Möglichkeit*)與「適當的起因造成」(*adäquate Verursachung*)等概念，對於章太炎再傳弟子范文瀾代替吳承仕而

---

\* 本文為2018年度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范文瀾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研究」(18BZS006)階段性成果。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勝義紛披，惟本文不及修改或力有未逮之處，仍有待他日重行釐訂。

\*\*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特聘研究員。  
聯絡電郵：[icyeh2017@163.com](mailto:icyeh2017@163.com)。

出線的歷史實然，試圖做出一番兼顧理論與實際之因果解釋。

關鍵詞：范文瀾、吳承仕、《中國通史簡編》、中國馬克思主義  
史學、客觀可能性(*objektive Möglichkeit*)、適當的起因造  
成(*adäquate Verursachung*)

## 一、緒論

1940年1月，范文瀾(1893-1969)剛滿四十七歲不久，在抗戰的烽火硝煙中隻身抵達延安，擔任當地的「最高學府」——馬列學院之歷史研究室主任，隨後便準備開始編撰《中國通史簡編》(本文以下簡稱為《簡編》)。正如域外學者毫不諱言地指出，在此之前，范文瀾的著述範圍從未進入馬克思主義史學領域。<sup>1</sup>因此，范氏何以在此時此刻，由此前鑽研無所不包的國學範疇(尤其是全神貫注於《文心雕龍》箋注)，忽然如周恩來(1898-1976)所言「腦子通了」，<sup>2</sup>轉而專心致志於史學研究，歷時後半生近三十年而始終不改其志，絕非如過去的論者所言那樣理所當然，順理成章。

范文瀾究竟為何變成一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最簡單的答案只需要一句話：因為毛澤東(1893-1976)的命令使然。由於范氏抵達延安之後，被安排到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工作，隨即因身為前輩，資歷年齒較長，取代陳伯達(1904-1989)被拱為主任。根據當時剛剛於馬列學院畢業，和范文瀾同一年被分配到歷史研究室的葉蠖生(1904-1990)之回憶：「范老主持工作後不久，毛澤東同志就直接向范老交待了一件任務，要求在短期內編出一本篇幅為十來萬字的中國通史。」<sup>3</sup>這就是《簡編》初版的由來。但是，細繹其間，毛澤東何以會在戰爭初期下達此道命令？為何是由范氏脫穎而出，雀屏中選？《簡編》日後如何取得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經典」地位？又為何其修訂版最後成了另一部書？這些都是不容易回答的問題。<sup>4</sup>晚近學界

<sup>1</sup> 羅梅君(Mechthild Leutner)著，孫立新譯，《政治與科學之間的歷史編纂——30和4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形成》(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頁35。

<sup>2</sup> 周恩來，〈學習毛澤東〉，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周恩來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上冊，頁333。

<sup>3</sup> 葉蠖生，〈我所瞭解的中國歷史研究室〉，收入溫濟澤等編，《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頁70。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很明確地被自視為1950年5月成立之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范文瀾生前始終擔任該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950-199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頁1。另見趙慶雲，《創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與史學發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第1章，頁12-69。

<sup>4</sup> 毛澤東畢生對歷史的愛好及其歷史知識之廣博，向來頗為受到學者注意。參見翟志

對於上述部分問題，已經有了多方面的解答。<sup>5</sup>本文則試圖從人事更迭與世代交替等結構性因素著眼，嘗試回應相關問題，希冀能對於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形成過程的討論有所裨益。

必須特別說明的是，范文瀾最終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大家的事實，並未導致本文預設以此為其一生之必然歸趨。正如傅斯年(1896-1950)身為國民黨員，在1927年12月的廣州暴動中，險些遭到中共逮捕，從而使他畢生對中共深惡痛絕一樣。<sup>6</sup>范氏在脫黨期間，兩次受到不同的國民政府關押（一為閻錫山之國民政府，一為蔣介石之國民政府），此後便不可能再為國民黨服務，只能投向「抗日」的中共懷抱。<sup>7</sup>這中間的演變過程，仍然充滿了意外與不可測的偶然因素。雖則范文瀾個人的牢獄之災，在左翼知識人於白色恐怖統治下的軌跡，實甚具其代表性。探討事實發展過程中的偶然與當然之處，正是本文所欲達到的目標。范氏唯一公開發表的自傳材料〈從煩惱到快樂〉一文，最早於1940年12月5日於延安出版，表明其前半生到此時為止的個人經歷與思想變化，學界對這份珍貴材料的重視似仍有所不足，值得在此重新加以檢視。<sup>8</sup>

成，〈毛澤東對明代歷史文化的吸取和應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6期(臺北，2012.06)，頁1-40。

- <sup>5</sup> 趙慶雲，〈范文瀾與中國通史撰著〉，《史學理論研究》，第4期(北京，2017.10)，頁23-32；李孝遷，〈紅色史學：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新論〉，《中共黨史研究》，第11期(北京，2018.11)，頁101-119，另見其〈革命與歷史：中國左派歷史讀物〉，《中共黨史研究》，第5期(北京，2017.05)，頁33-46。
- <sup>6</sup> Fan-sen Wang,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71. 關於廣州暴動，參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修訂版)上冊，頁190-191。
- <sup>7</sup> 詳見葉毅均，〈為何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范文瀾學術思想前傳〉(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第4章第2節，頁176-204。
- <sup>8</sup> 〈從煩惱到快樂〉一文，近來曾被收入由李孝遷與任虎編校的《近代中國史家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上冊，頁127-136。不過，該書所據為1941年刊於《學習》的較晚版本，內容頗因當日忌諱而將「共產」黨、汪「精衛」、抗「日」、「敵」人等字眼抹去。本文所引用的最早版本則無此種情況，雖然有極少數之處仍難免避諱。

## 二、范、吳兩人「從煩惱到快樂」的共同歷程

所謂的「從煩惱到快樂」，意指范文瀾從其幼年之「雀躍鼠竄，暢所欲為」，到「進書房」背書以後屢屢挨打的「苦惱生活」，升入學堂之後由於「受了功課的嚴重壓迫」，從而是「讀書苦惱，遊戲受罰」。直至就讀大學以後，范氏雖然克服了讀書這一道難關，卻依然感到「百無聊賴」。畢業後他以「老學究」之姿當個「教書匠」，仍不免遭遇橫逆，兩次被捕下獄。此一敘事後半伴隨著抗戰爆發，范文瀾毅然決定自己不再繼續跟著學校四處遷移，而要從「『教書匠』」升級當「『教員』」，其人生意義乃以加入中共游擊隊為歸宿。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敵人的炮火一步一步逼過來，我在高山上彷徨著，找不到該走的道路。我想，跟著學校逃難，逃到什麼時候才不逃呢？我決計退還聘書，跟游擊隊去幹一下罷。我參加新四軍，在游擊隊裡當教員。與離開學校前後對照，范氏儼然從此獲得了人生真諦，感到莫大的滿足。對他來說，「教書匠」與「教員」之間的差別，在於後者乃是「群眾的一分子」（意即前者高高在上，並非「群眾的一分子」）：

大學課堂裡儼然以「講書」為己任地教著書，確是個「匠」而非「員」。我曾在北京大學教「古曆術」，說來是「頗具高深的學問」，應該是（至少可以自以為是）「值得名貴」的。某次講完了一個麻煩問題，好像是記得春秋月食問題吧，學生某君問我，「我們學了這些有什麼用」？我窘了，我說，「學校教我教這門功課，我按照這門功課該講的講，到底什麼用，我不知道，我想學校也未必知道。」……而我在游擊隊以「外行」資格教書，卻從沒有人問我「學了什麼用」，反之，大樹下草垛旁講起書來，大家卻都聚精會神在聽我南腔北調難懂得很的「高論」。於是我很高興，當了二十幾年的僅憑出賣教書技術吃飯的「教書匠」，現在竟升級當「教員」，成為群眾的一分子，可以和群眾彼此自由的交換智識了。<sup>9</sup>（底線為筆者所加）

<sup>9</sup> 范文瀾，〈從煩惱到快樂〉，《中國青年》，第3卷第2期（延安，1940.12），頁70-71。收入《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匯編》編委會編，《紅色檔案——延安時期

換句話說，此時此刻，范文瀾才自認為從傳統的士人階級，轉變成現代的知識「份子」，從而找到自身的嶄新定位。<sup>10</sup>從現實致用的角度來看，即使是在戰前，范氏都無法面對學生(及其自身)關於學問如何應用的質疑。過去整理國故的「高深學問」，當然就更不能在外敵入侵的險峻局勢下繼續維持了。<sup>11</sup>反之則是加入群眾，以群眾喜聞樂見的講課內容放言「高論」，「交換智識」，眾人反倒是「聚精會神」，無人置疑。只是和胡適、顧頡剛等人相比(一者出任駐美大使，一者籌辦《禹貢半月刊》和通俗讀物編刊社)，范文瀾書生報國的方式為直接加入游擊隊，確實更加草根激進一些。<sup>12</sup>

不僅如此，范氏還進一步前往延安，對他個人的生命歷程來說，從此展開了新的一頁：

朋友某君認為我還有學習上進的可能，介紹我到延安來。我「過五關斬六將」，衝破若干險阻，居然走到「寤寐求之」的邊區了！快樂得把鋪蓋丟棄在汽車上。多光明的邊區啊！

我到邊區了！我清算過去四五十年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曰煩惱。現在開始清爽快樂的生活了！<sup>13</sup>

「朋友某君」指的應是劉少奇(1898-1969)，因劉氏時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當范文瀾於1939年9月重新加入中共，隔月便決定讓范氏「轉移到延安」，並「帶著劉少奇致毛澤東的親筆信」。<sup>14</sup>選擇延安而非重慶，當然是一種政治選擇，同時包含了價值判斷。這是一種「上進」，而非墮落，因而值

文獻檔案匯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3)第5冊，頁142-143。

<sup>10</sup> 王汎森，〈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頁275-302。這當然也和近代讀書人「搞革命」的嚮往有關。參見羅志田，〈士變：20世紀上半葉中國讀書人的革命情懷〉，《近代讀書人的思想世界與治學取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104-141。

<sup>11</sup> 葉毅均，〈范文瀾與整理國故運動〉，《近代史研究》，第1期(北京，2018)，頁4-22。

<sup>12</sup> 張忠棟，〈出使美國的再評價〉，《胡適五論》(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0)，頁113-155；陳學然，〈「重起爐竈」：民族危機與顧頡剛學術思想的轉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總第62期(香港，2016.01)，頁165-202。

<sup>13</sup> 范文瀾，〈從煩惱到快樂〉，《中國青年》，第3卷第2期，頁71。收入《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匯編》編委會編，《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匯編》第5冊，頁143。

<sup>14</sup> 徐曰彪、朱瑞熙，〈范文瀾傳略〉，收入陳翔華等編，《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傳略》(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第11輯，頁158。

得排除一切困難，抵達「邊區」。「從煩惱到快樂」之立言宗旨，在此也就明白托出。比范文瀾早兩年來到延安的趙儷生(1917-2007)，晚年曾經如此說明：

說到延安，後來人們一直叫它「聖地」。正如毛澤東說美帝是紙老虎又是鐵老虎，最終是紙老虎一樣，聖地有它「聖」的一面，也有不一定怎麼「聖」的一面，最終還是不愧為「聖」地。「聖」在哪裡？我的答案是，革命的、抗日的理想主義，百折不回，就憑這一點，它「聖」。當時全國都呼喊抗日，但有假的，有半真半假的，只有這裡的聲音是最真誠的，最高亢的，最打動人心的。不然，為什麼南洋華僑不遠萬里往陝北奔呢？<sup>15</sup>

以上評估，從日後被打為右派份子，文革中又不斷遭到鬥爭，與家人生離死別，最終勉強倖存之人口中說出，多少有其個人的真實性與時代之代表性。<sup>16</sup>

接著，范文瀾又表達他到延安將近一年以來，「個人的快意處」：

第一，我酷愛學習，在邊區外當教書匠，忙著「為人師」，極少學習的機會。即使偶有，因怕「別人說閒話，找岔兒」，「聽來歷不明人講演，惹是非」等等原因，不得增益新知識，邊區恰恰相反，任何人都都在熱心學習著。我以前對馬列主義茫無所知，這一年來自信進步不少。我如果努力不懈，一定還會進步。<sup>17</sup>

所謂「熱心學習」者，當然不是毫無別擇，來者不拒，而是以馬列主義為主。這顯然是國統區與淪陷區所沒有的自由。當時在延安以外，學習馬列主義則有「怕『別人說閒話，找岔兒』，『聽來歷不明人講演，惹是非』」等顧慮。後者不禁令人想起如魯迅之「北平五講」，范文瀾連與同志們聚會也

<sup>15</sup> 趙儷生，《籬瑾堂自敘》，收入趙儷生、高昭一，《趙儷生、高昭一夫婦回憶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頁54。

<sup>16</sup> 高昭一，《回首憶當年》，收入趙儷生、高昭一，《趙儷生、高昭一夫婦回憶錄》，第7、8章，頁314-344。

<sup>17</sup> 范文瀾，《從煩惱到快樂》，《中國青年》，第3卷第2期，頁71。收入《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匯編》編委會編，《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匯編》第5冊，頁143。

得秘密安排，暗中進行；<sup>18</sup>前者則使人聯想及於另一位范氏的忘年之交，與范文瀾的老師黃侃(1886-1935)齊名、被陸宗達(1905-1988)譽為「南黃北吳」的章太炎門下高第吳承仕(字檢齋，1884-1939)。<sup>19</sup>與吳氏私交甚篤的楊樹達(1885-1956)，曾在1934年1月29日記有一件軼事：

……檢齋近日頗泛覽譯本「社會經濟學」書，聞者群以為怪，交口訾之。一日，一友為余言之。余云：「君與余看新書，人以為怪，猶可說也；若檢齋乃太炎弟子，太炎本以參合新舊起家，檢齋所為，正傳衣鉢，何足怪也？」友人語塞，無以難也。<sup>20</sup>

所謂「新書」也者，如下所述，其實屬於馬派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一類之書籍。吳氏當時任中國大學國學系系主任，以舊學深湛之小學大家，改為攻讀「社會科學」一類新書，十分罕見，以致「群以為怪，交口訾之」，可見那時讀此類書，除了違法亂禁之外，范文瀾深怕別人藉此說閒話找碴，並非虛語。

根據吳承仕的弟子張致祥(1909-2009)之回憶，他的另一位同門齊燕銘(1907-1978)，曾向吳氏「介紹了一些當時的馬列主義譯作，和反映蘇聯新社會的出版物」，包含「《反杜林論》、《資本論》、《辯證唯物主義教程》等。」為了貼近當時對國學系課程深表不滿，因而時起風潮、進行罷課的學生，吳承仕從此翻然改圖，比范文瀾更早一步將馬列主義應用於其傳統學問的鑽研之中。張氏自己的近身觀察如下：

<sup>18</sup> 詳見葉毅均，〈為何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范文瀾學術思想前傳〉，第4章第2節，頁176-204。

<sup>19</sup> 陸宗達，〈從舊經學到馬列主義歷史哲學的躍進——回憶吳承仕先生的學術成就〉，《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北京，1984.04)，頁13。

<sup>20</sup>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55-56。楊氏此一友人或許是孫蜀丞(人和)。因有學生記載，孫氏批評吳承仕「不要老朋友了，也不搞學問了」，只是「跟著年輕人跑，老了還不走正道」。總之一句話，他變了。參見張枏，〈永難泯滅的記憶〉，收入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頁81。同樣是章門弟子的錢玄同，據說也曾經當面嘲諷過吳氏之轉向唯物史觀；王志之，〈憶吳承仕先生〉，收入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頁74。章太炎本人似亦不認可其轉向，其說待考；呂振羽，〈悼吳檢齋先生〉，收入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頁153。



……從此，檢齋先生以鑽研經學、文字學、訓詁學的嚴肅態度，來研讀當時可能買到的社會科學方面的書，並且像讀古籍一樣，在這些書上用蠅頭小楷的眉批，寫上自己的心得體會。馬列主義的真理打開了他的心扉，他以之為指南，根據他的「六經皆史」的見解，開始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重新研究古代歷史，改寫他的講義；並且開始重新剖析時勢，從憂慮失望、無能為力的狀態中擺脫出來，找到努力的方向和希望。……<sup>21</sup>

吳承仕與范文瀾所走的學術道路，竟然不約而同頗有極其相近之處。在思想層面上，此處所描述之吳氏「從憂慮失望、無能為力的狀態中擺脫出來，找到努力的方向和希望」，更和范氏之「從煩惱到快樂」有著驚人的一致性。吾人當不能以其為純粹的宣傳文字，等閒視之。況且，與吳承仕為忘年之交的陳伯達（詳後），曾引用吳氏一封信札，內中明言：「自惟平生所學，若校勘，〔、〕考訂，〔、〕說經，〔、〕解字諸術，當其有得，差足與乾嘉諸老比肩，然此祇以鼓吹休明，丁此時艱，實為無用之長物」。陳氏以為，「這恐怕是他給朋友們的最後一封信了。」<sup>22</sup>可見吳氏「煩惱」的緣由，仍是起於學問之「無用」。這和前文所言，范文瀾因學生之問而答以學問之有用無用，又是何其相似！

在行動上，吳承仕繼踵范文瀾之後，陸續聘請曹靖華(1897-1987)等人至其國學系開課。范文瀾此前已經應吳氏邀請，在中國大學開設「文心雕龍」課程，兩人因而有同事之雅。<sup>23</sup>1940年代初期，在延安馬列學院（後改組為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室協助范氏編寫《簡編》的佟冬(1905-1996)，曾有如下回憶：

<sup>21</sup> 張致祥，〈憶我的老師和同志吳承仕〉，收入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頁11。

<sup>22</sup> 陳伯達，〈痛悼吳承仕先生〉，《讀書月報》，第1卷第12期（延安，1940.12），頁28。

<sup>23</sup> 曹靖華，〈懷念吳檢齋先生〉，收入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頁7；余修，〈遺教風範，長流人間——追念吳承仕同志〉，收入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頁23。一說吳之聘曹，還是經由范文瀾介紹的。史立德，〈憶吳檢齋師於「一二·九」運動前後數事〉，收入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頁89。

……范文瀾同志在歷史研究室曾向我們談過，他在北平女子文理學院任院長時(1930年代初)，被國民黨憲兵三團逮捕，剛被營救釋放，吳先生(按：即吳承仕)即到他家，要求介紹進步書籍(馬列主義書籍)。范說，他很為難，給吧，怕有敵探偵隨：[；]不給吧，吳先生態度很誠懇、真摯，又是老師輩的長者，無已，給予一本陳望道同志譯本《共產黨宣言》。以此，可以想見吳先生的思想轉變和黨的組織關係了。<sup>24</sup>

文中提及憲兵三團，應指1935年范文瀾二次被捕出獄之事。同樣在此時為范氏助手的榮孟源(1913-1985)，其回憶對於此事時間點的記述雖有所不同，但內容則大體一致：

解放戰爭期間，幾次聽到范文瀾同志談起吳先生(按：亦為吳承仕)思想轉變的開始。范老說：1930年秋，他因共產黨的嫌疑被捕，經過多方營救，才得釋放。吳先生去看他。吳先生說：「像你這樣的老實人，能夠參加共產黨，共產黨一定有個道理。能不能把共產黨的書借給我看看。」范老因吳先生是長輩，不便拒絕，就拿一本《共產黨宣言》給吳先生。幾天之後，吳先生來還書時說：「這本書講得很有道理。難怪你要參加共產黨。」從此，吳先生就認真學習馬列主義，「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習更為積極。……<sup>25</sup>

兩者相較之下，榮氏所記似乎更為合理近實，佟氏所言恐怕是將范文瀾前後兩次被捕事相混。<sup>26</sup>無論如何，范、吳兩人有著共同語言和實際交往，於此應無疑義。吳承仕過去教過的許多學生如前引之齊燕銘、佟冬、榮孟源等人，方才不過數年之後，也在延安成為范氏編寫史書的重要幫手。這批

<sup>24</sup> 佟冬，〈對於吳檢齋先生的片斷回憶〉，收入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頁88。

<sup>25</sup> 榮孟源，〈悼念吳檢齋先生〉，收入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頁101。

<sup>26</sup> 吳氏《傳略》作者亦採取榮孟源之說法，並補充范文瀾所借書籍，首先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其次才是《共產黨宣言》。參見胡雲富、侯剛，〈吳承仕傳略〉，收入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頁202。另見莊華峰，〈吳承仕生平及著述活動年表(1884-1939)〉，收入莊華峰編，《吳承仕研究資料集》(合肥：黃山書社，1990)，頁18。

人顯然於思想上擁有共同淵源，在行動上頗為同步，同樣接受中共的領導，因而他們在延安一道聚首，並非偶然之事，而是經過嚴密組織聯繫的集體行動。

### 三、「主義」的安頓力量

除了學習馬列主義之外，范文瀾又歷數延安的三大優點：

第二，共產黨確是光明磊落，領導全人類的政黨，它對黨員非黨員一視同仁，因才而使，絕對沒有偏私的意見。我是教書匠出身，所以讓我安心研究「本行事業」。圖書館中國古書很豐富，盡我能力自由去探求，結果，感覺到能力太缺乏了。想起過去像煞有介事地做「誤人子弟」工作，真是罪過不小。

第三，共產黨愛惜人才（雖然我並非人才），確是無微不至。即使是個人生活方面極小的節目，也是隨時注意，盡可能想法改善，保障「安心研究」的成功。我確信，誰想成就自己的學問（不是空談騙人的學問），應該想法進邊區來。我又確信，目前全中國找不到像邊區那樣安靜的地方，能讓讀書人無牽無礙，有吃有穿，平心靜氣進行讀書和研究。

第四，單從文化方面說，邊區是中國的文化中心地，也就是新興文化的心臟。許多著名學者，聚在集〔聚集在〕延安周圍幾里路以內，他們研究的心得，隨時開會報告。還有各式各樣的討論會、座談會、研究會、學習小組，請他們出席指導做結論。試問，什麼地方能夠接近這樣多的明師益友呢？所以居住邊區的人，就是不很用功，也會飛躍的進步。<sup>27</sup>

從中共之「愛惜人才」，使他得以「安心研究」「本行事業」，到慶幸自己身處中國的「文化中心」，事實上窮山惡水、資源匱乏的延安真可謂盡善盡美

<sup>27</sup> 范文瀾，〈從煩惱到快樂〉，《中國青年》，第3卷第2期，頁71-72。收入《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匯編》編委會編，《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匯編》第5冊，頁143-144。

之至，簡直就是范氏在十一年前的《水經注寫景文鈔》序言中所描述的那個「大樂園」了。或許范文瀾真心以為，延安實現了他長久以來的烏托邦夢想。<sup>28</sup>

在重視范氏此文珍貴的史料價值之餘，筆者也注意到，〈從煩惱到快樂〉屬於一種特定文類，旨在說明當時的一個特定問題。王汎森曾經討論「『煩悶』的本質是什麼」，「從新文化運動之後青年界常見的『煩悶』或『虛無』的狀態入手，探索『主義』在私人領域的賦予意義、積極導引、提供答案等三個方面的藍圖」。<sup>29</sup>這些「煩惱」、「苦悶」、「莫名其妙」等字眼，起因為新文化運動所帶來的好像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所謂「除魅」後的世界(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sup>30</sup>，使得人們開始追問「人生的意義是什麼？」。王氏指出：

……新文化運動一方面是解放的、希望的，樂觀地認為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尋找到真正屬於「人」的文化，但是解放的另一方面是生命意義都得由自己重新造起，因此也有人感到茫然而無所適從，對他們而言，新文化運動帶來解放，同時也帶來煩悶感或失落感。加上無政府主義等思潮的影響，進一步加強了文化中的解消及懷疑的力量……

<sup>28</sup> 關於延安的生態環境和經濟生產狀況，可見Lyman Van Slyke,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Vol. 13, Part 2, eds.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632-635. 至於對延安的各種正面觀感，參見裴毅然，《烏托邦的幻滅：延安一代士林》（臺北：新銳文創出版社，2014），頁101-112。附帶一提，該著搜集材料不少，但偶有錯謬之處，如謂范文瀾曾任「孫中山秘書」（頁569）。負面印象則一讀蕭軍之《延安日記1940-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足矣。另可參考迪斌，〈歷史記憶的多重建構——論延安敘事的三種形態〉，《中共黨史研究》，第3期（北京，2014.03），頁52-59、71；楊東，〈循名責實——「延安」的概念史及其在戰時的建構表達〉，《中共黨史研究》，第11期（北京，2016.11），頁42-52。

<sup>29</sup> 王汎森，〈「煩悶」的本質是什麼——近代中國的私人領域與「主義」的崛起〉，《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頁115。

<sup>30</sup> Richard Swedberg and Ola Agevall, *The Max Weber Dictionary: Key Words and Central Concepts* (2nd ed. Stanford: Stanford Social Sciences, 2016), 86-87. 不過，王文並未明確引用韋伯。

像瞿秋白(1899-1935)這樣的人，便主張「可以用社會科學來為人生指出一個方向，探悉社會現象的『必然』因果律之後，主觀意志則循因果律而行，才有真正的自由意志可言，然後再由人生觀導向行動」。如此一來，新興的「社會科學」就成了「救國之學」：

……人生觀問題所牽涉的，不僅限於人生觀而已，對人生觀的困惑與渴望，往往引領青年走到包括歷史唯物主義(historical materialism)在內的各種新主義的大門，他們往往在對傳統人生觀不滿而又對新人生觀感到茫然時，在各種新主義中找到一種新的人生指引。

……人生觀與歷史觀結合，找出「自己的歷史定位」，「自己的歷史使命」，並引向反帝、反封建，構成一整套系統的、有說服力的論述，從此生活本身不再是沒有確定答案的問題，也不再是沒有方向的浮萍。生命中的煩惱往往也可能是導向救國道路的開始。

王文強調「轉喻」的作用：「『主義』時代常見的宣傳正是盡可能地把日常生活的煩悶、挫折、憤怒『轉喻』成國家的命運，而解決這林林總總的煩悶與挫折最終都要靠『主義』。」為了尋找出路，解決青年們迫切的就業問題，「主義」更是不可或缺：

……如果只是單純為生活而找出路，選擇是多樣的。但如果有人能把生活的出路、生命意義的出路、國家的出路三者串聯在一起解決則更為吸引人。「主義」宣傳中所提供的架構把每個問題的性質及解決方法皆重新定義，所以出路也是重新定義過的，是三種出路合而為一的，它不僅只是當時振興教育與擴展實業的主旋律，而是在「主義」的指導下，從事改造社會的革命，一條全新的出路。

因此，王氏引用恽代英(1895-1931)的見解，說明 1920 年代中期的北方青年，普遍認為除了讀死書和玩耍之外，只有一條路走：「『到黃埔去』——到黃埔，在校免除一切費用，畢業之後『有比較可靠之出路的』，而在此意義上，它是在確定可循的主義指導下邁向革命者的歸宿。到黃埔是一條符合生命意義、經濟生活與救國的新出路。後來當然又增加『到武漢去』及『到延安去』。」<sup>31</sup>值得注意的是，該文據以證明青年感到「苦悶」的資料，

<sup>31</sup> 王汎森，〈「煩悶」的本質是什麼——近代中國的私人領域與「主義」的崛起〉，

大多出自 1920 年代在上海、廣州、漢口等地相繼出版的《中國青年》(1923-1927)。這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而〈從煩惱到快樂〉一文，則是刊於 1939 年後在延安復刊之《中國青年》(1939-1941)。兩者是一脈相承的關係。<sup>32</sup>因此，我們應當將范文放在同一脈絡與議題下來檢視其意義。

在延安復刊之《中國青年》，由胡喬木(1912-1992)擔任總編，該刊之〈發刊詞〉最末有云：

我們希望重新出版的《中國青年》能夠繼承並發揚大革命前《中國青年》的光榮事業，像過去的《中國青年》推動了千百萬中國青年投入了大革命浪潮一樣，我們今天的《中國青年》要能夠推動，組織更廣大的青年到抗日戰爭中來。並且拿我們的工作來紀念《中國青年》的編者，中國青年領袖惲代英、蕭楚女諸同志。<sup>33</sup>

可見他們是有意識地繼承十餘年前革命前輩的宣傳工作。筆者之所以不憚繁瑣引用上述文字，主要是在說明范文瀾對延安的完美描繪與全心獻身，有其思想根源與發展歷程，至少可以溯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歷史情

---

《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頁113-163，所引頁126、133、134-135、141、149、158、159。王師進一步申論由左派社會科學所形塑的「主義」內涵與胡適等人提倡的「新學術」(亦即整理國故運動)有何不同：「『新學術』想把『事實』與『價值』分開，『求真』是其主要目標，『善』與『美』則不是關注的範圍。但是左派的社會科學，既求『真』，也對如何到達『善』與『美』提出行動的方案：一、它是研究人類社會的學問，以經濟為其基礎，涵蓋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風俗、藝術、哲學、科學等。二、它是一種科學，尋找因果律。三、它不但研究過去歷史，而且發現『公律』，以指導人們的行為。依照所發現的『公律』，現在及未來的發展都有確定的方向、道路，有整張藍圖可資依循。四、由於上層建築是下層建築之反映，所以可以解釋包括道德變動在內的所有人文現象。所以它是社會現實的，是真的、善的，也是美的，合知識、信念、信仰、行動為一」(頁147-148)。惲代英其實是五四之子，對於其早期在武漢的生涯，晚近的研究可參閱Shakhar Rahav, *The Rise of Political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China: May Fourth Societies and the Roots of Mass-Party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sup>32</sup> 徐信華，《中國共產黨早期報刊與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頁40-41；劉蘇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出版史研究(1937-1947)》(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128。

<sup>33</sup> 馮文彬，〈發刊詞〉，《中國青年》，第1卷第1期(延安，1939.04)，頁2；《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匯編》編委會編，《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匯編》(陝西人民出版社，2013)第3冊，頁2。

境。儘管范氏並非五四之子，但也不能免於受到波及。當年疏離於五四學生運動這個事實，更使他不似傅斯年那樣，日後必須承受「五四精神的負擔」(burden of the May Fourth mentality)，反倒可以盡情改宗，不受心理上的約束。<sup>34</sup>尤其是本文強調，范氏在 1920 年代原本深受整理國故運動的深刻影響，憑藉其師門訓練和自身之刻苦用功，廢寢忘食地從事其學術事業。但到了 1930 年代，由於「救亡」的時代要求日甚一日，「整理國故」對他而言愈來愈不切實際，徒增「煩惱」。最後不免盡棄舊業，另謀他途。若非「黨組織」量才器使，命歸本行，范文瀾是否還會重拾學術，甚而專注於歷史寫作，歷經數十年如一日，實在沒有人可以保證。

#### 四、「到延安去」

另一個偶然因素，則是前面提及的吳承仕之早亡。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歸來的陳伯達，長期擔任毛澤東之秘書，日後雖曾在文革初期權傾一時，但隨即遭整肅下獄，在改革開放的年代裡，無人願意提起這個惡名昭彰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之名。其子陳曉農為了幫父親發聲，根據他的口述，說明「發展吳承仕等進步的文化人加入中國共產黨，建立特別黨小組，是陳伯達在北平從事地下工作時所做的一件重要事情。」由於吳氏聘請陳伯達至其國學系任教，兩人遂逐漸往來密切，後者乃決意吸收前者入黨，接受北方局的領導。陳氏自己的回憶如下：

這幾位同志分別是：吳承仕、曹靖華、張致祥、齊燕銘、孫席珍。

當時，組織上考慮他們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樣過組織生活，就決定組成一一個特別黨小組，由張致祥任組長，由我負責直接與北方局聯繫。

陳曉農則在其後加以按語：

發展吳承仕先生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三十年代的中共黨史上，是值得認真書寫一筆的。在此之前，還沒有一位在學術界有這樣高地位的著名學者加入中共黨組織，尤其是當時仍處於革命的低潮時期，在白色恐怖的摧殘迫害之下，中共的隊伍嚴重減員，而吳承仕先生

---

<sup>34</sup> Fan-sen Wang,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h. 5, 140-163.

恰於此時，在他的知己好友的幫助和介紹之下，毅然加入中共，這實在不是一件平凡的事，畢竟，中共黨內有專門學識並有重要影響的高級知識份子，在當時是太少了。<sup>35</sup>

陳曉農敘述此事，當然是為了表揚其父功績，帶有為其鳴冤之意。但經過檢別之後，仍有助於我們還原歷史事實。

范文瀾和吳承仕兩人相比，後者較前者年長近十歲。就輩份和資歷而言，一位是章太炎親傳弟子，一位是章氏再傳弟子（黃侃亦屬章門），當然是吳氏更為德高望重一些。就實際著手應用馬列主義，以從事傳統學問之研究而言，就讀國學系的榮孟源亦謂，吳承仕「應是用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來研究中國經學、文字學的創始人」，「也是國學大師教導學生們學習馬列主義的第一人」。<sup>36</sup>因而在當時引人側目，甚至遭受訕笑，以其先發之故，良有以也。相反地，在當時的左翼人士看來，吳承仕當然就是令人景仰不已了。侯外廬(1903-1987)曾經回憶：

那時候，我與黃松齡交往很密切，從他那裡聽到許多吳承仕思想轉變的動人故事。我確知，自郭沫若發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提出中國古代存在奴隸社會的歷史發展階段以後，在當時已經取得較大成就的學者中間，只有為數很少的人願意放棄自己固有的見解，固有的研究方法，重新學步，以求進入一個陌生的，而不是全新的認

<sup>35</sup>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公司，2005），頁53、56。吳承仕加入中共的時間為1936年。參見胡雲富、侯剛，〈吳承仕傳略〉，收入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頁215。孫席珍則回憶，他和齊燕銘、張致祥都屬於由陳伯達擔任小組長的特別黨員小組。孫席珍，〈關於北方左聯的事情〉，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左聯回憶錄》編輯組編，《左聯回憶錄》（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10），頁397。基本上可以證實陳氏所言。但有關曹靖華入黨一事，陳伯達的記憶似不確。現行的中共黨史敘述，明確說明曹氏在抗戰期間曾向周恩來要求入黨，並願赴延安，但為後者所拒，要求他留在黨外，待在國統區進行統戰工作。直到1956年，曹靖華才由馮雪峰等人介紹，正式入黨。參見冷柯，〈曹靖華〉，收入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第48卷，頁313、317。

<sup>36</sup> 榮孟源，〈悼念吳檢齋先生〉，收入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頁100-101。榮氏關於課堂的回憶頗為有趣，因吳承仕「每講完一段」，「總是向同學們問：『這樣講，辯證不辯證？』」令其印象深刻，多年後言猶在耳。



識領域。而公認有大成就的吳承仕先生，便是這少數人中的其中一位。

因此，吳氏「追求真理的熱忱」，便成為侯氏及其友朋之間的談論話題。甚而日後被專治思想史的侯外廬拿來和魯迅相比擬，因「在太炎門下，有兩位弟子通過全然不同的路徑，殊途同歸，都走向信仰馬克思主義」。<sup>37</sup>可知吳承仕深具象徵性的身份，非同一般，方有可能變成談資。正如同樣就讀於國學系的王西彥(1914-1999)如此這般評論其師長：「像他這樣的學術界名宿也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就強辯地說明了科學真理在中國的巨大勝利。」<sup>38</sup>

吳承仕在抗戰爆發後避居天津的英國租界。既然他已成為正式黨員，據說毛澤東曾派人欲「接他赴延安講授經學」，但其事因故不果。<sup>39</sup>最後吳氏貧病交加，過世時年僅五十六歲。<sup>40</sup>相反地，吳承仕病逝次年(1940)，范文瀾則是如其所述地「過五關斬六將」，在奔赴延安的路上，據說還曾因攜帶禁書而遭到「國民黨特務」的扣押，時間長達兩個月之久。<sup>41</sup>歷經險阻之

<sup>37</sup> 侯外廬，《韌的追求》(北京：三聯書店，1985)，頁38。

<sup>38</sup> 王西彥，〈從學者到戰士——記我所接觸到的吳承仕先生〉，收入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頁53。王氏此語，當然也說明了「科學」在二十世紀中國如何主宰了「真理」。參見金觀濤、劉青峰，〈從「格物致知」到「科學」、「生產力」——知識體系和文化關係的思想史研究〉，《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頁319-356。

<sup>39</sup> 胡雲富、侯剛，〈吳承仕傳略〉，收入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頁220-221。〈傳略〉此處所言，應當是依據張枬之回憶：1939年秋，延安方面得知吳氏身故，一位原中國大學的老師告訴他，「黨中央、毛主席本已決定邀先生來延安，請他講授經學、小學，請他用辯證唯物主義研究經學，研究中國歷史。『要知道，是別人做不到的。有人跟他的學問相仿，卻不懂馬克思主義。』」張枬，〈永難泯滅的記憶〉，收入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頁77。末語所指，是否針對或適用於范文瀾，則是一個有趣的問題。無論如何，毛主席的決定應與陳伯達有關。因後者明確表示：「我時常和朋友們談起，要請他〔按：即吳承仕〕到後方來，從事學問的工作。」陳伯達，〈痛悼吳承仕先生〉，《讀書月報》，第1卷第12期，頁28。

<sup>40</sup> 吳承仕剛過世時，死因眾說紛紜。今日學者以其家屬所述為主，傾向於是發病不治而亡。牛潤珍、范國強，〈壯烈比諸文山——抗戰英烈、國學大師吳承仕罹難八十年祭〉，《歷史教學》(下半月刊)，第9期(天津，2019.09)，頁21-22。

<sup>41</sup> 范元維，〈我的父親范文瀾在河南的一段經歷〉，《范文瀾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10卷，頁515-516。

後，最後他不但安然脫身，順利抵達陝北，當年隨即受命在延安新哲學年會上講演經學簡史，其演講提綱發表於《中國文化》之上，文前有曰：

延安新哲學年會教我試講中國經學的簡史，「五四」運動以前二千多年裡面，所謂學問，幾乎專指經學而言。學人以名列儒林為榮，著述以敷贊聖旨為貴，派別繁雜，訓解浩瀚，我對這門學問，既所知有限，藉以批判經學的馬列主義，更未能窺見途徑，談不到正確運用。那末，我這次試講，一定錯誤很多，毫無疑問。我把講演提綱發表出來，希望學術界友人，盡量給它嚴厲的駁正，使它完成研究經學的初步任務。在沒有接到批評以前，先向友人致給我批評的謝意。——范文瀾識。<sup>42</sup>

經學史相當於傳統學問，非同小可。在此文正式刊發之前，范氏早已得到「學術界友人」的指教，正是出自毛澤東之來信：

文瀾同志：

提綱讀了，十分高興，倘能寫出來，必有大益，因為用馬克思主義清算經學這是頭一次，因為目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復古反動十分猖獗，目前思想鬥爭的第一任務就是反對這種反動。你的歷史學工作繼續下去，對這一鬥爭必有大的影響。第三次講演因病沒有聽到，不知對康〔、〕梁〔、〕章〔、〕胡的錯誤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吳虞〔、〕葉德輝等人否？越對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學術界發生影響。

我對歷史完全無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學得一點，深為幸事。致以敬禮！

毛澤東 九月五日<sup>43</sup>

這就是蔡美彪所說，「范老每向我們談及此事，即引為莫大的榮幸，深感毛澤東對他的歷史學工作的關懷和鼓勵。」范氏甚至從此珍藏此封信函，「經過延安撤退和解放戰爭時期輾轉各地，仍然保存完好。」直到范文瀾身故，

<sup>42</sup> 范文瀾，〈中國經學史的演變〉，《范文瀾全集》，第10卷，頁44。

<sup>43</sup> 毛澤東，〈致范文瀾〉，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163。

才由家屬將這封信上交。<sup>44</sup>如果吳承仕當年能順利抵達延安，以其被今日學者封為「我國第一位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作指導從事經學研究的學者」<sup>45</sup>之身分，針對當時「復古反動」的「思想鬥爭」，以「馬克思主義清算經學」的重大任務，或許就不會落到范氏頭上。此因吳氏生前在《文史》上刊佈的多篇論文，如〈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者對於喪服應認識的幾個根本觀念〉、〈語言文字之演進過程與社會意識形態〉、〈五倫說之歷史觀〉等等，早已著其先鞭，皆為「力圖以馬列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法觀點研究古代經學、禮制、哲學和語言文字者」。<sup>46</sup>而毛澤東的特別關懷，或也由此將別有所屬。范文瀾的著述工作往後會往何處發展，則更將難以預料。或許重拾《文心雕龍》研究，或者致力編寫國文課本。<sup>47</sup>

這裡涉及到的是韋伯曾經討論過的「客觀可能性」(*objektive Möglichkeit, objective probability*)議題。<sup>48</sup>歷史能否假設？史家可否提出「如

<sup>44</sup> 蔡美彪，〈毛澤東〈致范文瀾〉信讀後〉，《學林舊事》(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100。

<sup>45</sup> 莊華峰，〈由舊經學向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的轉變——吳承仕學術成就初探〉，《史學理論研究》，第3期(北京，2000.07)，頁47。

<sup>46</sup> 黃壽祺，〈略述先師吳承仕先生的學術成就〉，《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北京，1984.04)，頁11-12。陸宗達甚至有謂，「檢齋先生曾有過一個打算，他準備先將『三禮名物』的材料整理出來，考訂真偽，作成有系統的敘述，名之為文獻檢討篇；再比較異同，確定中國歷史某時期的經濟型態相當於哪一社會發展階段，名之為史實審定篇。」陸宗達，〈從舊經學到馬列主義歷史哲學的躍進——回憶吳承仕先生的學術成就〉，《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頁14。由此可見，吳承仕確已進入當時中國社會史論戰之論域。另外，據說吳承仕留下甚多未定遺稿，流散四方。吳氏弟子們多次嘗試蒐集，「但由於長期社會動亂和後來的十年浩劫等種種原因，使得整理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響」。詳見王延模，〈近代徽州學人吳承仕學術著述的整理過程述略〉，《社會科學論壇》，第11期(石家莊，2016.11)，頁119-129，所引在頁121。

<sup>47</sup> 即使在1940年代末期，范文瀾之學術業已轉向之後，趙儷生仍注意到，「范老住在後花園裡。……他們的臥室裡只不過一盤河北式的大炕，……范老睡在西頭，頭邊安一小桌，放一盞油燈，桌上放著他平生喜愛的《文心雕龍》校注稿，上面朱墨斑駁，批著若干增注，這稿子是他睡覺也不離開的。」參見趙儷生，《籬榭堂自敘》，收入趙儷生、高昭一，《趙儷生、高昭一夫婦回憶錄》，頁107。另外，根據葉蠖生的回憶，毛澤東曾指定由范文瀾負責編選出一部《中國國文選》，以供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閱讀。該書於1942年出版，同樣獲得毛氏之稱道。葉蠖生，〈我所了解的中國歷史研究室〉，收入溫濟澤等編，《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頁75。

<sup>48</sup> 本文使用“objective probability”而非“objective possibility”之英譯，追隨的是Fritz Ringer的意譯。渠以為前者雖非如後者之直譯，卻較符合韋伯(及其先行者)之原

果……」的問題？韋伯本人的意見是肯定的：

……像「如果俾斯麥沒有做出發動戰爭的決定，後來有可能會發生什麼？」的這種提問，也絕非「多餘的」問題。因為，正是這種提問涉及了那對「實在之歷史上的形構」而言具有決定性的東西：在所有那些必須恰恰處於這種、而不是任何其他情況下才會恰恰產生此一結果之為數無限多的「環節」之整體的內部，這項個體性的決定究竟應該具有什麼樣的因果上的**意義**，而在歷史性的陳述中，該決定又應該具有什麼樣的地位。只要歷史學想要將自己提升而超越某種單純只是對值得注意的事件與人格加以編年的格局，則它勢將別無他途，只能提出這樣的一些問題。並且，只要歷史學是一門科學，它也都是如此進行研究工作的。……<sup>49</sup>(粗體字為原文所有，以下皆同)

1866年普奧戰爭(亦即「德意志戰爭」)，若無俾斯麥之意志行動，結果必將大為不同，最終德意志帝國能否順利成立，尚且在未定之天。從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角度進行思考，韋伯自當時的心理學與法哲學中汲取養分，轉而討論歷史學的歸因問題，從而提出了「客觀可能性」的概念：「如果某一個因果上的個別成分被設想為被排除掉了或改變了，則根據經驗之種種普遍的規則『將會』發生什麼事情」。<sup>50</sup>這樣的說法並非為主觀任意性打開大門，任由想像力馳騁其間。因為韋伯強烈反對正面建構「將會如何」的問題，而毋寧是主張從負面提問的回答著手，以確定某一歷史事實在因果關係上的重要性：

---

意。Fritz Ringer, *Max Weber's Methodology: The Unification of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64, n. 1; 67, n. 6. 儘管如此，新版的《韋伯辭典》(*The Max Weber Dictionary*)仍然維持“objective possibility”的舊有譯法不變。Richard Swedberg and Ola Agevall, *The Max Weber Dictionary: Key Words and Central Concepts*, 226-228.

<sup>49</sup> 馬克思·韋伯(Max Weber)著，張旺山譯，〈在「文化科學的邏輯」這個領域的一些批判性的研究〉，《韋伯方法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頁299。此書為漢語世界首次將韋伯之方法論論文由德文逐譯而來的全譯本，意義重大，自不待言。

<sup>50</sup> 韋伯著，張旺山譯，〈在「文化科學的邏輯」這個領域的一些批判性的研究〉，《韋伯方法論文集》，頁311。

……如果……根據我們的知識的狀況，就算排除或改變該事實，該進程在那些「歷史上重要的」、亦即我們感到興趣的點上，根據普遍的經驗規則，亦將可以**恰恰如**其實際上產生的結果那樣「被期待著」，則該事實也就是事實上在因果上毫無意義的，並且絕對不屬於歷史學的因果上的回溯所想要、也應該確立的那條鎖煉。<sup>51</sup>

提出一個「客觀的可能性判斷」，其實是為了「充當顯示種種**確定性**程度之某種完整的刻度尺」：

……「客觀的『可能性』——判斷」根據其本質就可以有種種的**程度等級**，並且人們可以仿照在對「或然率計算」進行邏輯上的分析時所運用的那些原則，如此地想像這邏輯上的關係，使得人們可以將某些因果上的成分——該判斷所涉及的，就是這些成分之「可能的」結果——孤立地相對於所有其他跟這些成分一起發生影響的、**可以想像的**條件的全體加以設想，並問道：所有那些「當它們出現的時候，那些孤立地被設想的成分，就會『適合於』造成那『可能的』結果」的條件這個範圍，和所有那些「當它們出現的時候，它們『可以預期地』**並不會**造成該結果」的條件這個範圍，二者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sup>52</sup>

韋伯甚至認為，沒有這種關於促進程度的判斷，我們根本就無法區分因果關係上的重要與否。

本文對於吳承仕來到延安與否的設想，當然屬於一種韋伯式的「客觀的可能性判斷」。目的不在於異想天開地發揮想像力，幻想各種歷史發展的可能進程，而是確證吳承仕其人之早亡與范文瀾順利抵達延安，乃屬一事之兩面，兩者一道為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打開了結構上的可能性。正是在這一點上，如同韋伯所描述：「**如果**我們設想某一個個別的歷史事實並未出現、或者有所改變地出現在某一個由種種歷史條件所構成的複合體中，則這一點**將會**制約著種種歷史事件之某種在某些特定的、**在歷史**

<sup>51</sup> 韋伯著，張旺山譯，〈在「文化科學的邏輯」這個領域的一些批判性的研究〉，頁317。

<sup>52</sup> 韋伯著，張旺山譯，〈在「文化科學的邏輯」這個領域的一些批判性的研究〉，頁317-318。

上重要的關係上有所改變的進程」，<sup>53</sup>這樣的歷史判斷，確實是有可能得出的。范文瀾最終代替吳承仕而出線，成為延安史學的一面旗幟，連帶造成了左翼史家接班隊伍的世代變遷。在此一過程中，吳氏之枉死可謂為韋伯所界定的「偶然的起因造成」(*zufällige Verursachung, accidental causation*)；而范氏之倖存則為「適當的起因造成」(*adäquate Verursachung, adequate causation*)。與「偶然的」相對立者並非「必然的」，而是「適當的」。這是吾人「以抽象的方式將那些存在於事變的『材料』中的種種『條件』的一個部分孤立了出來，並將它變成『可能性判斷』的物件，以便以此方式藉由種種經驗規則獲得對事變的那些個別的組成部分之因果上的『意義』的洞見。為了看穿實在的因果關聯，我們**建構不實在的**。」<sup>54</sup>韋伯此種「反事實」(*counterfactual*)的思考方式，對於我們理解歷史發展過程中萬端的複雜性，其實大有助益。當然，左派史學經過 1930 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洗禮之後，正欲破繭而出，即使范文瀾未能抵達延安擔當此一任務，也會有其他人繼之而起，只是往後的事態發展已不容吾人輕易設想了。

無論如何，從延安時期開始，如同陳伯達為毛澤東之頭號理論家，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法，以及「毛澤東思想」的形成上居功厥偉；范文瀾則因緣際會，成為毛澤東的首要大史官。當毛主席於黨內攀向權力顛峰的過程中，范氏在從上古到近代之歷史解釋的鬥爭上，處處附和其意，給予一臂之力。<sup>55</sup>陳、范兩人在中共黨內意識型態的形塑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足堪比擬。極具象徵意義的是，1940 年 4 月 14 日舉辦的「延安各界蔡元培、吳承仕先生追悼大會」，首先由中共「五老」之一的吳玉章(1878-1966)進行報告，其次則由范文瀾、陳伯達兩人「分別簡略報告兩先

<sup>53</sup> 韋伯著，張旺山譯，〈在「文化科學的邏輯」這個領域的一些批判性的研究〉，頁 301。

<sup>54</sup> 韋伯著，張旺山譯，〈在「文化科學的邏輯」這個領域的一些批判性的研究〉，頁 320-322。

<sup>55</sup> Raymond F. 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Huaiyin Li, *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Ch. 3, 74-109.

生的生平」。<sup>56</sup>事後看來，范、陳兩人當時得以上臺報告，及其各自所具有之代表性，似乎即預示了往後中共意識型態發展的歷史。

---

<sup>56</sup> 高平叔編，《蔡元培年譜長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第4卷，頁531。

## 徵引書目

### *Bibliography*

#### (一)、史料

- 《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匯編》編委會編，《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匯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3影印本。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周恩來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950-199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左聯回憶錄》編輯組主編，《左聯回憶錄》，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10。
- 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
- 李孝遷、任虎編校，《近代中國史家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侯外廬，《韌的追求》，北京：三聯書店，1985。
- 范文瀾，《范文瀾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莊華峰編，《吳承仕研究資料集》，合肥：黃山書社，1990。
- 陳伯達，〈痛悼吳承仕先生〉，《讀書月報》，第1卷第12期(延安，1940.12)，頁27-28。
-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公司，2005。
-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 溫濟澤等編，《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 趙儷生、高昭一，《趙儷生、高昭一夫婦回憶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 蕭軍，《延安日記 1940-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

#### (二)、近人論著

- 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48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
-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
-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



- 公司，2017。
- 王延模，〈近代徽州學人吳承仕學術著述的整理過程述略〉，《社會科學論壇》，第11期(石家莊，2016.11)，頁119-129。
- 牛潤珍、范國強，〈壯烈比諸文山——抗戰英烈、國學大師吳承仕罹難八十年祭〉，《歷史教學》，第9期(天津，2019.09)，頁14-22。
- 李孝遷，〈紅色史學：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新論〉，《中共黨史研究》，第11期(北京，2018.11)，頁101-119。
- 李孝遷，〈革命與歷史：中國左派歷史讀物〉，《中共黨史研究》，第5期(北京，2017.05)，頁33-46。
-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 迪斌，〈歷史記憶的多重建構——論延安敘事的三種形態〉，《中共黨史研究》，第3期(北京，2014.03)，頁52-59、71。
- 韋伯(Max Weber)著，張旺山譯，《韋伯方法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 徐信華，《中國共產黨早期報刊與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高平叔編，《蔡元培年譜長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 張忠棟，《胡適五論》，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0。
- 莊華峰，〈從舊經學向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的轉變——吳承仕學術成就初探〉，《史學理論研究》，第3期(北京，2000.07)，頁47-53。
-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修訂版。
- 陳翔華等編，《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傳略》第11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
- 陳學然，〈「重起爐竈」：民族危機與顧頡剛學術思想的轉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總第62期(香港，2016.01)，頁165-202。
- 陸宗達，〈從舊經學到馬列主義歷史哲學的躍進——回憶吳承仕先生的學術成就〉，《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北京，1984.04)，頁13-15。
- 黃壽祺，〈略述先師吳承仕先生的學術成就〉，《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北京，1984.04)，頁1-12。
- 楊東，〈循名責實——「延安」的概念史及其在戰時的建構表達〉，《中共黨史研究》，第11期(北京，2016.11)，頁42-52。
- 葉毅均，〈范文瀾與整理國故運動〉，《近代史研究》，第1期(北京，2018.01)，頁4-22。
- 葉毅均，〈為何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范文瀾學術思想前傳〉，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
- 翟志成，〈毛澤東對明代歷史文化的吸取和應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6期(臺北，2012.06)，頁1-40。

- 裴毅然，〈《烏托邦的幻滅：延安一代士林》〉，臺北：新銳文創出版社，2014。
- 趙慶雲，〈《創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與史學發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 趙慶雲，〈《范文瀾與中國通史撰著》〉，《史學理論研究》，第4期(北京，2017.10)，頁23-32。
- 劉蘇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出版史研究(1937-1947)》〉，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 蔡美彪，〈《學林舊事》〉，北京：中華書局，2012。
- 羅志田，〈《近代讀書人的思想世界與治學取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 羅梅君(Mechthild Leutner)著，孫立新譯，〈《政治與科學之間的歷史編纂——30和4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形成》〉，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
- Fairbank, John 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Vol. 13,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Li, Huaiyin. *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 Rahav, Shakhari. *The Rise of Political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China: May Fourth Societies and the Roots of Mass-Party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Ringer, Fritz. *Max Weber's Methodology: The Unification of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Swedberg, Richard, and Ola Agevall. *The Max Weber Dictionary: Key Words and Central Concepts*, 2<sup>nd</sup> ed. Stanford: Stanford Social Sciences, 2016.
- Wang, Fan-sen.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Wylie, Raymond F.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Fan Wen-lan and Wu Cheng-shi: The Generational Transition of Early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Yeh, Yi-Chun

Research Fellow, History Department (Zhuhai),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Fan Wen-lan has bee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Chinese Marxist historians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However, the time when he did appl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his work *A Brief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was as late as in the early 1940s. Due to the overwhelming popularity of this masterpiece, Fan became the standard-bearer of Yan'an revolutionary historiograph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not explain this whole process in terms of some kind of teleology with hindsight. There were indeed alternative leading scholars who have an advantage over Fan Wen-lan, such as Zhang Binglin's disciple Wu Cheng-shi. Parallel to Fan'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towards Marxism, Wu had an extremely similar line of progress. If Wu had been survived to arrive in Yan'an, the historiographical landscape would be completely different. In the present article, Max Weber's concepts "objective probability" and "adjective causation" serve as intellectual tools probing into the question in dispute.

**Keywords: Fan Wen-lan, Wu Cheng-shi, A Brief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objective probability, adequate causation**

